

紫竹评论



让实体经济回归需要大智慧

■ 本报评论员 李锦

2012年12月9日，中国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论坛将在京举行，这是党的十八大后经济学界、企业界与新闻界一次有意义的活动，这自然是件很热闹的事，当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多少道道。因为实体经济讨论已经一年半时间了，严重性、必要性、重要性，都已经是陈词滥调了，调子高喊了一年多了，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由虚变强的征兆。多数人开的所谓药方似乎多是“丹参、黄芪”之类，吃了无害也几乎无用。症结是否找到，如何破解这道死穴，从哪里入手，人们期望大智慧的出现。

看得多了，说得多了，人们慢慢地都弄明白了这些症状：实体经济空心化是金融危机导致，金融危机似乎是过度的金融创新所致。眼下，企业的日子已经很难受了，很多是过不去冬天了。最有名的温州金融改革便是一例，喊了9个月，几乎是“按兵不动”，可是没有“破釜沉舟”的项羽出来，僵局总破不了。

该说的废话已说完，留下不少笑话。当前，最大的笑话是让狼来说不吃羊。银行赚的钱是从企业身上得来的，要银行不赚钱就像叫狼说不吃羊一样。而目前的中国现状是，从小银行到大银行的行长们都出来表态要支持企业，尤其是中小企业。他们越是眯着双眼说着甜蜜的话，越是让羊们害怕，因为他们总是这么说，而羊们总是少了一只又一只。

中国的实体空心化重病是什么时候出现，是2009年春天。本来美国金融危机只是波及中国沿海出口企业，后来我们自己狂发钱，狂投资。美国人得病，我们吃药，吃出浮肿。虚拟经济这只老虎放出来了便不肯回归，于是泡沫经济大发展，实体经济大萎缩。能记得的时间是2011年9月21日，温州人因为放高利贷跑了，温州事变发生了。此时才得知，这里1/3的钱搞房地产，1/3放高利贷，剩下的1/3做实业。后来一看，岂止温州，整个中国都向这个方向发展，钱炒钱，成了强悍的新文化，不由分说的占领了大中国。这时候，已不再是银行，企业也办银行炒钱。后来得知一个数字，2000年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比为0.9:1，2008年达到3.5:1，近两年更快速增长，2010年两者比例已达9.8:1。中国陷于虚拟经济泥沼而不能自拔，其深层原因是对经济发展阶段的错误判断而疏于把握。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，这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判断的重大失误。

我们判断的失误，还在于过早强调第三产业与虚拟经济，违背了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，第三产业的发展



CNS 供图

学者分析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困局的四大判断错误在于：一是错误地判断金融创新的历史条件，金融走得太急太快；二是错误地把握虚拟经济的标准，使得天平一头高一头低；三是错误地把实业与金融部门管理体制分开，使得银行与企业变成“羊与狼”；四是错误地让金融部门牵头搞金改，延长实体经济回归进程。

逐步超过第一、二产业，最终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。而发展中国家总是喜好跟着发达国家走，在第一、二产业还未发展起来，资本就大规模从工业实体转移到了服务业和资本市场，出现产业空心化。就像是孩子还未学会走，就想跑一样。虚拟经济发展急于求成，有可能反而一事无成。在日本遭遇产业空心化带来的“失去的十年”、美国因实业与虚拟经济失衡引爆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似乎在毫不迟疑地滑向美日已经走过的老路，产业空心化正在动摇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基，最终酿成危机。

不可否认，在某一特定时期内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发散性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，实体经济最终决定着虚拟经济可能达到的规模或程度，当两者之间的发散度达到一定程度时，经济金融可能通过极端的方式重新实现“收敛”。而这种较为极端的方式就是实体经济危机的爆发，便是目前这种状况。

问题似乎越来越清楚，我们对国

情、世情与历史发展趋势的情况把握都不够准确。

一是错误地判断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，过于强调金融创新，走得太急太快。

二是错误地把握虚拟经济的标准，像天平一头高一头低，衡量金融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企业起来了，这是第一于求成，有可能反而一事无成。在日本遭遇产业空心化带来的“失去的十年”、美国因实业与虚拟经济失衡引爆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似乎在毫不迟疑地滑向美日已经走过的老路，产业空心化正在动摇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基，最终酿成危机。

三是错误地把金融与实业部门分开，两个部门分开管理，使得银行与企业变成“羊与狼”而不是“鱼与水”的关系。与双重体制并存相对应，政策也在两种状态中变动。

四是错误地让金融部门牵头搞金融改革，自己革自己的命，只会有一种结果：保护自己利益，延长实体经济回归进程。

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错误，使我们的金融走快了；发展动力与平衡错误，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了；管理体制的错误，使两支队伍分走了；金融改革的主体错了，使改革方向弄偏了。这四大错误便是实体经济难以回归的四大穴，最后的死穴便是顶层

设计，需要在顶层设计上“攻坚克难”。到这时候人们才明白让“鱼水”变成“狼羊”，是体制设计错误。让银行成为狼，不是狼的错误，因为他们本来便不是狼，也不想做狼，他们赚钱大容易了，自己都不好意思。温州金融改革陷入困境，也不是银行的错误，因为他们本来便不想改变自己命运。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，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。让它们变革，只会阻挠资源的重新分配。

显然，谁是改革主体，改变什么，目标是什么，怎样聚集力量，都需要重新设计。

历史的逻辑，往往是左右冲突不得出而另辟蹊径。话说到这里，我们对实体经济回归这道死穴的破解之道便可以找到了。当前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

从发展战略上，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，以实体经济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为基础，以实体经济立国这个根本不能变，金融要弱化，不要走的过早过快。

从发展动力上，让实体做强，虚拟做实，应该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话。虚由实生，实仗虚行，以实为本，以虚为用，需要再温习老祖宗的教导了。

从发展平衡上，要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持续发展为标准，必须确立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观念，放弃银行增值第一的思路。

从体制上，要把金融与实体经济高层监管部门合二为一，不要一分为二。在“二元经济结构”使得整个经济系统被分割为两个部门。这个“二元经济结构”必须结束，而不是强化。

让快的慢下来，让重的轻下来，让分的合起来，让不肯改革的站到一边去。谁来办这个事情，顶层设计，最高决策层重新设计。

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实体经济的两段话，“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，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”，“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。”这是对社会公众殷切期盼的回应，也是对实体经济回归的新的动员。

现在是中国到了攻坚克难最为关键时期了。“攻坚克难”，这是十八大报告主题词中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主题词所没有过的，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，将是对“攻坚克难”的一个检验。

马上要举办的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的论坛，应是一个“攻坚克难”的会。我们希望少听到“多么艰难”的痛陈、“多么重要”的感叹，只想多听到一点道道，听到解决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智慧。现在的中国，太需要攻坚克难的大智慧了。

（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）

温州金改本末倒置 亟须顶层设计破解

■ 本报记者 蒋皓 实习生 陈楚楚

日前，温州金改细则推出，暴露出“改皮不改骨”的问题。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展无力，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由虚变强的征兆，对此，专家呼吁找准实体经济空心化症结，破解实体空心化要靠顶层设计解决。

温州金改“改皮不改骨”引起多方失望

从去年9月出现的“温州金融风波”，到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“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”，在这场被普遍认为是“危机催生改革”的金融体制改革中，温州成为解决经济金融领域突出问题的试验基地，它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示范平台，也是体现全国金融改革方向的重要窗口。

日前出台的温州金融改革细则表明，温州金改的核心是盘活民间资金，在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之间搭建桥梁。细则核心有三点，一是创新民间金融。包括科技贷款、小额担保贷款、经营权质押贷款、股权质押贷款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、林权抵押贷款、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等支农支小信贷业务。积极探索试点排污权抵押贷款、农房抵押贷款、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、农业设施及农业机械抵押贷款等。

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，温州经济面临转型，中国经济面临转型，抓住转型过程中的要害，以民间信用体制建设，建立阳光借贷平台，才是温州金改的出路。难道我们对此前三十年温州民间金融屡战屡败的反思，仅仅局限于这十二条吗？之所以一再关注温州希望这个市场经济的圣地能够顺利转型，对金融改革的反思力度太弱。是真的看不到，还是有意为之？如果是后者，就可怕了。

温州中小企业改革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，不应该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：“目前各地政府为了规避风险，反而倒过来，让民营企业的龙头企业把钱拿出来去筹建小贷公司、村镇银行，让实体经济办银行，本末倒置”，“实体经济都去搞金融，哪还会有心思搞实体？这实际不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损害实体经济。”

只有用金融的手段和平台，把大量民间资本特别是闲置的资本集聚起来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，才是金改最重要的——这是从根本上质疑目前的金改方案。

“沈阳消费网”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所谓金改是被当时温州资金断裂而不得不弄的一场救援行动，高层并不真想改。

网友“大道从简”认为，不是成功概率在下降，而是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失败的结局。国有商业银行不愿也不敢信贷支持，你的金改其实就是希望引导有钱人拿自己的血汗钱去赌，试问各位，谁干？而有钱人则希望借助国家政策吸存放贷去赌过去不曾敢想的银行业，所以卡住了。

金改思路找错方向 实体经济前途渺茫

温州金改早在10年前就由戴相龙提出，但是国务院批准用了整整十年时间，可惜即使如此耗时，利率也没有市场化，也没有准许民间资金组建民营银行，改革的力度甚至不如十年前的设想，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，改革的滞后能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转化为阻碍生产力提升的阻力，在温州就表现的比较明显，也许十年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，这就叫代价！金融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，经济改革落后于社会进步，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。

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，让银行部门到温州抓金融改革试验，最终很难会形成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决策。根据分利集团理论，利益集团一旦形成，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，因为重大的变革会改变分利集团间的相对地位，甚至导致某些分利集团瓦解。即使它们接受了变革，仍将会阻挠资源的重新分配，阻碍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。部门利益集团正逐渐成为中国的最大阻碍。指望金融部门挽救实体经济，只是口号而已。

网友“ee189”认为，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，就不可能达成改革共识，利益博弈将更趋复杂。

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，目前的中国应该重新审视实体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，合理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平衡，合理促进保持财富创造和财富之间的分配关系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，是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所造成的，表现在从2000年到2008年，全球GDP从约30万亿美元增长至约50万亿，同期内，全球市值却从160万亿增长至800万亿；此外，主权债务危机频频发生；多国的房地产、金融产业等快速发展，实业比重则迅速降低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等问题。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，必然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，当不稳定系统中没有资金的流入来保持它的企稳状态的话，必然会造成问题。

金融学者谭雅玲认为，近期我国对策接二连三出台，实际上许多状况并非是我们对策的初衷可以实现，并会有结果。因为我们目前的市场状态有点混乱，心态很急切，状态很过头，无论对经济大方向的判断，或对金融具体对策的解读以及对我们市场化的理解，有点偏颇，不利于市场前行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回归理性和常态，正确理解现状与对策，以便把握未来改革的方向。

回望近半年实体经济讨论，关注顶层设计的人甚少。从两会前后有关银行“暴利”的争议中，国人已明显感到了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。当前改革已进入“深水区”，涉及面广，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，难度极大。当部门难以超越自身利益的时候，决策就不会因此而受阻，高层决策层正在开始有所决断。李锦认为，这并不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，不需要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，但是搞好顶层设计也不是一件易事，打破部门利益，需要大智慧。

对话



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晓：

要把国民幸福指数列入经济增长目标

■ 本报记者 王敏

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，刚刚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：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”日前，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了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晓，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：人民的幸福成了新一代领导人奋斗的目标，您怎样看待幸福这个词呢？

赵晓：我的答案是，幸福就是经济增长的“量”与“质”，“量”用“GDP”（国内生产总值）反映，而“质”可以用“GNH”（国民幸福指数）反映。

幸福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“幸福经济学”奠基人伊斯特林(R. Easterlin)的话一语中的：没有经济增

长很难有幸福，但有了经济增长也不一定幸福。

这句话指出了经济手段对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阶段性约束特点。经济短缺时，经济的增“量”很重要，而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，经济的提“质”可能就更重要了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：2011年，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，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等发达地区人均GDP更是超过了10000美元，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。可以说“短缺经济”时代已然过去，“质量经济”时代是不是应该来临呢？

赵晓：十八大的召开，为“质量经济”开辟了契机。在未来的“质量经济”发展中，新思维的建立很重要。

首先，GDP代表的是新创造的全部财富，而不是国民所拥有的财富。

其次，GDP仅表示新增加的财富总量，而不管财富的质量。在贫穷国家或者经济发展初期，解决温饱问题往往放在第一位，快速提升GDP总量可能很重要。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，GDP质量就不能再被忽视。

过去的三十年，我们走的是“高速增长低质量”的路子。有报道称，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，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%左右，但这些损失都没有计入到GDP中。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也曾透露，“在中国信访总量、集体上访量、非正常上访量、群体性事件发生率实现下降的情况下，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却以每年30%以上的速度上升”。

因此，“中增长高质量”或者“低